

# 明清通俗小说江南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

冯保善<sup>\*</sup>

〔摘要〕明清通俗小说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审美对象的小说“经典”作品,只能发生在小说“尊体”,打破了以“小道视之”的传统观念以后。但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首刊和精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文本,得以及时以相对定型的审美客体呈现于世人面前,进而成为“经典”存在;“奇书”概念在江南出现并广为人知,标志通俗小说“经典”作品被明确发现,同时暗含小说“尊体”的萌蘖;江南通俗小说精批精选,对作品博大意蕴、艺术奥秘的阐释,对其卓越创造、伟大张力及范式意义的揭示,则意味着小说作品“经典”地位初步确立。明清通俗小说的江南传播,成为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传播;经典化

## 引言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sup>①</sup>也就是说,堪称为“经”的书籍,能够说明天、地、人的常理,揭示永恒不变的真理,具有不可改易的训示和典范意义。今人云:“经典体现历史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即在时间将一切销毁的当中得到保存。在过去的事物中,只有并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才为历史认识提供可能,而这正是传统的一般性质。正如黑格尔所说,经典是‘自身有意义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释’。但那归根到底就意味着,经典能够自我保存正是由于它自身有意义并能自我解释;也就是说,它所说的话并不是关于已经过去的事物的陈述,即并不是仍需解释的文献式证明,相反,它似乎是特别针对着现在来说话。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的距离,因为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它已经自己克服了这种距离。因此经典无疑是‘没有时间性’的,然而这种无时间性正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sup>②</sup>经典具有穿越时空、持续不竭的现代性和历久弥新的当下意义。

而文学经典,其“本身自然必须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作为文学中审美创新与新的形式的发现,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蕴的具体的描写中——不管其描写方式如何,它们应是表

---

<sup>\*</sup>文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21003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文化视野下明清通俗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4BZW096)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赵仲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南宁: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31页。

<sup>②</sup>张隆溪:《经典在阐释学上的意义》,《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九卷第三期。

现了最具人性的东西,具有属于全人类的、未来的成分,以及在‘自律’与‘他律’张力之间维持高度紧张的因素,并能进入‘长远历史’而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sup>①</sup>。简而言之,即文学经典应当具有人性的深刻性、文化意蕴的丰富性和引领潮流的艺术范式意义。

明清通俗小说中并不乏这样的经典之作。如众周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正是这样的作品。但其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普世公认的审美对象的“经典”作品,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又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并且还与其在江南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学界尚未见人揭橥。故略加申说,以为抛砖引玉。

## 一、明清江南小说刊印与小说经典生产

在已刊拙文中,论述了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与该区域拥有全国最庞大的娱乐消费群体,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中心,繁荣的文化消费市场密切相关<sup>②</sup>;而小说生产与消费、戏曲曲艺对小说故事的传播、小说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以此为标志要素的江南小说文化的崛起,使得明清江南较之其他区域有着更适宜通俗小说发展的文化生态<sup>③</sup>。小说经典多首刊于江南,其善本精刊集中于江南,便是很好的明证。

首先,我们看小说经典的作者及其首刊。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或称之“杭人”<sup>④</sup>、“钱塘人”<sup>⑤</sup>,其籍贯未必是杭州,其人却与杭州关系密切,甚至不排除在此完成小说创作的可能。由该书最早刊本嘉靖元年刻庸愚子(金华人蒋大器)序可知,其成书以后,最初在江南一带流传。因此,有学者推测,此本可能即刊于江南特别是南京<sup>⑥</sup>。《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扬州府兴化县人,据载曾客居苏州,为张士诚幕僚。《水浒传》今知最早刊本,为传说中的武定侯郭勋嘉靖年间家刻本;今见最早刊本,是残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嘉靖刊本《京本忠义传》(残叶)。武定侯郭勋本又有《张凤翼序刻武定版忠义水浒传》,序约撰于万历十六年(1588),是现存最早的《水浒传》序<sup>⑦</sup>。苏州张凤翼序刻本不传,应该是刊刻于苏州。《西游记》作者,一般认为是南直淮安人吴承恩,曾读书于南京。该书的最早和最佳刊本,即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其兰陵是否南兰陵有待确证,但首先披露该书抄本消息者袁宏道,时任吴县县令;其消息来源,得之于松江华亭人董其昌。该书首刊本万历四十五年(1617)《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苏州。苏州冯梦龙所编辑“三言”的原刊本有:泰昌天启年间苏州天许斋刊《古今小说》,天启四年(1631)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天启七年(1627)苏州叶敬池刊《醒世恒言》。吴敬梓在南京创作《儒林外史》,该书最早刊本为乾隆年间金兆燕扬州刻本(未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于南京,“秦淮风月”“扬州旧梦”的生活经历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该书成一百二十回全帙,由苏州人程伟元整理刻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为镇江丹徒人,其书首刊于上海杂志《绣像小说》,最早的单行本由上海神州日报馆印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趼人为广东南海人,流寓上海创作小说,该书首刊于上海杂志《新小说》,最早的单行本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为常州府武进县人,流寓上海,该书首刊于上海《世界繁华报》,最

① 吴子林:《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钱中文《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② 冯保善:《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冯保善:《明清江南小说文化论》,《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辩证类》,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⑤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0—181页。

⑦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

早的单行本由世界繁华报馆印行;《孽海花》作者曾朴为苏州常熟人,该书由上海《小说林》书社首发。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其一,这些经典小说的作者均与江南联系至密;其二,其创作多发生于江南区域;其三,大抵首刊于江南一带。显而易见,江南文化生态对于明清通俗小说经典的生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其次,我们看小说经典的精刊。

1.《三国志演义》:(1)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万卷楼《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十二卷;(2)约万历后期杭州杨尔曾夷白堂《新镌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二十四卷;(3)明末苏州绿荫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4)明末苏州黎光楼植槐堂《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5)明末苏州《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十卷;(6)康熙十八年李渔序醉耕堂刊《四大奇书第一种》(毛评初刻本);(7)清初金陵翼圣堂《李笠翁先生批阅三国志》一百二十回。上述均为二十四卷系本。

2.《水浒传》:(1)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新安刻本《忠义水浒传》;(2)明张凤翼序刻武定版《忠义水浒传》;(3)万历三十八年杭州容与堂刻《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4)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刻《出像评点忠义水滸全书》;(5)崇祯年间苏州郁郁堂刻《李卓吾忠义水滸全传》;(6)崇祯年间苏州宝翰楼刻《文杏堂批评水滸全传》;(7)崇祯十四年苏州贯华堂刻《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3.《西游记》:(1)万历二十年陈元之序金陵世德堂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2)明刻袁于令题词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3)康熙二年汪象旭刊《西游证道书》;(4)清代前期金陵世德堂刊《西游真诠》。

4.《金瓶梅》:(1)万历四十五年苏州书坊刻东吴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2)明末杭州刻《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3)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在扬州、金陵、苏州发售)。

5.“三言”:(1)泰昌、天启年间苏州天许斋刊《古今小说》;(2)天启四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3)天启七年苏州叶敬池刊《醒世恒言》。

6.《今古奇观》:清初宝翰楼刊《今古奇观》(又名《喻世明言二刻》,原刊本)。

7.《儒林外史》:(1)乾隆年间金兆燕扬州初刻本;(2)嘉庆八年刊卧闲草堂本;(3)同治十三年上海申报馆刊《儒林外史》;(4)光绪七年申报馆第二次活印本。

上述小说作品的不断翻刻再版,广为流布,已经显示了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多为精刊,亦学界所公认。其中大部分迄今依然为各家整理本选作底本。正是明清江南通俗小说的精刊,使得第一流的小说作品以相对定型的文本,作为审美对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相比较,明代建阳小说出版,从扩大声势,让社会认识接受小说文体而言,自有不容否认的意义。然正如明人所说:“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sup>①</sup>;“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sup>②</sup>。偷工减料,伪劣刻印,其对小说作品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特别在通俗小说处于遭世人歧视的起步时期,粗陋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小说印本,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明天都外臣序《水浒传》中云:“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浑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便道出了世俗庸人随意删削妄增之于《水浒传》造成的灾难。明金陵书坊主人周曰校撰《三国志通俗演义识语》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憾焉。辄购求古本,

<sup>①</sup>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第555页。

<sup>②</sup>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校讎。……鉴者顾諟书而求诸,斯为奇货之可居。”由此宣传广告,我们也不难察知,已有刻本之鱼鲁亥豕、伪舛百出,为读者深恶痛绝,所以,周日校强调已刻之“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校讎”,正是顺应读者对精本的需求而生。

江南小说出版的精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金文京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说:“留都南京、南宋旧都杭州以及经济中心苏州等江南各大城市在当时都是文化最发达的先进地方。张尚德本刊于何处虽然不详,但很可能就在这些城市,尤其可能就在南京。江南系统中的一些版本如张尚德本一般不带插图,纵有插图也非上图下文版式,而是一整页或相对两页相连的大幅插图,且画工极其精美。与福建本相较,可谓高级版本。”<sup>①</sup>江南其他小说刻本,也普遍具有这样的特征。如上所开列的明清江南小说刊本,醉耕堂刊《三国演义》毛评本,《水浒传》容与堂本、袁无涯本、金圣叹评本,《西游记》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古今小说》苏州天许斋本,《警世通言》金陵兼善堂本,《醒世恒言》苏州叶敬池本,《今古奇观》宝翰楼本,《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等,其中固然有着原刊与评点改订本等差异在,却一致体现出精刊本的特色。

从小说作者,特别是小说出版,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江南区域对于通俗小说经典的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四大奇书”与小说经典的发现

康熙十八年(1679),小说戏曲家李渔撰《古本三国志序》,其中云: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当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李渔认为,作品的归类,当以类相从,他显然更赞同苏州才子冯梦龙的看法,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并称“四大奇书”。平心而论,王世贞的说法未尝不可,将属于大众文艺的小说戏曲作品与《庄子》《史记》这样的经典文体名著齐名并称,反映出他过人的胆识和不俗的眼光,且以他的身份振臂一呼,对改变世人关于通俗文体的看法,也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然而,冯梦龙、李渔的认识,小说文体自觉意识更为鲜明,甚至包含了朦胧的“尊体”意识在其中,这不仅对于小说文体的独立发展意义重大,并且,只有“尊体”,打破传统将小说小道视之的观念,先有“经典小说”文体,才会有“小说经典”作品,这是小说走向经典化的必由之路。

但李渔所提及的冯梦龙有“四大奇书”一说,不知何据?墨憨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有张无咎序(改泰昌元年天许斋《北宋三遂平妖传序》而成,一般认为张氏乃冯梦龙托名),其中谈到了小说“奇书”的话题:

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资齿牙,不可动肝肺。《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间乎。尝辟诸传奇:《水浒》,《西厢》也;《三国志》,《琵琶记》也;《西游》则近日《牡丹亭》之类矣。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终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

这篇序言中,对于《水浒》《三国》《西游》《玉娇丽》《金瓶梅》,均给予高度评价,谓之“奇书”。

<sup>①</sup>金文京:《三国演义的世界》,第180—181页。



倘若李渔的说法由此而来,则“四大奇书”专名的发明,还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首创。

不过,在李渔之前,“四大奇书”确已是呼之欲出了。万历年间,李贽任职于南京刑部,提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包括司马迁《史记》、杜工部《杜子美集》、苏轼《苏子瞻集》、施耐庵《水浒传》、李梦阳《李献吉集》)<sup>①</sup>。天启三年(1623)烟霞外史序《韩湘子全传》云:“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褻淫。”崇祯元年(1628)崢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说:“故不学《水浒》之组织事态,不效《西游》之布置幻境,不习《金瓶梅》之闺情,不祖《三国》之机诈。”崇祯年间,金圣叹提出“六才子书”(包括《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明末,爽阁主人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中说:“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方之劣矣。”朱之蕃《三教开迷演义序》中说:“顾世之演义传记颇多,如《三国》之智,《水浒》之侠,《西游》之幻,皆足以省醒魔而广智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词》中说:“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词》中说:“《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清顺治间,西湖钓叟序《续金瓶梅》中说:“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中说:“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齐齐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这些论说,均出现在李渔之前,其论列作品多寡不一,文体不一,具体好恶也各有差异,但或列之于“五大部文章”“六才子书”“四大书”“三大奇书”,或将其作为评价其他小说作品的参照,足以见出四部小说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

出版家李渔明确提出小说“四大奇书”,并集中刊印,于是这一称法更加深入人心,广为人知。需要表而出之的是,康熙年间,刘廷玑《在园杂志》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对“四大奇书”做了空前系统的论说:

降而至于“四大奇书”,则专事稗官,取一人一事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数十卷者。如《水浒》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天下最难写者英雄,而各传则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难写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传则别样英雄、别样美人也。串插连贯,各具机杼,真是写生妙手。……再则《三国演义》。演义者,本有其事,而添设敷演,非无中生有者比也。蜀、吴、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虽不能体《春秋》正统之义,亦不肯效陈寿之徇私偏侧。中间叙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园结义,战阵回合,不脱稗官窠臼。……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丘长春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根本,而五众以配五行,平空结构,是一蜃楼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谜,引谜入悟。其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哉?……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sup>②</sup>

此后,“四大奇书”偶或有不同的说法,如观鉴我斋《儿女英雄传序》、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分别以《红楼梦》《封神演义》取代《三国演义》。特别是《红楼梦》横空出世后,人们惊叹这才是“小说家第一品也”,更有人提出《红楼梦》才是“第一才子书”,于是,就有了鲁迅所说的:“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sup>③</sup>近世出版以《三国演义》《水浒》《西游》《红楼梦》合刊,并称“四大名著”,追根溯源,正由“四大奇书”而来。由此亦可窥知明清通俗小说经典化过程之一斑。

①周晖:《金陵琐事》卷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②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3—84页。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72页。

综观上述,首先,令人惊喜的是,“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西湖钓叟《续金瓶梅序》),在浩如烟海的说部中,几部小说脱颖而出,人们察觉到它们的超迈群伦,卓然独立,认识到即便“小道”之中,也有堪称“经典”的作品。其次,令人称奇的是,在李渔明确提出“四大奇书”之前,所谓的“五大部文章”“六才子书”“四大书”“三大奇书”等说法,均在江南提出,流行于江南,其倡导者也多与江南关系密切,如:王世贞为苏州府太仓州人;李渔为浙江兰溪人,长期生活于杭州、南京;李贽为福建泉州人,任职南京刑部期间提出“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烟霞外史,由其序落款“天启癸亥季夏朔日烟霞外史题于泰和堂”,小说《韩湘子全传》第一回署“武林泰和仙客评阅”,可知其应该为武林(杭州)人;崢霄主人陆云龙为钱塘(杭州)书商;金圣叹为苏州人;爽阁主人夏履先为钱塘书坊主;天许斋主人为苏州书坊主;幔亭过客,即袁于令,为苏州人;西湖钓叟为钱塘人或流寓钱塘者;笑花主人应该为苏州人。准此,我们不妨说,这诸多关于通俗小说的新评价,既是晚明以来江南文化发展孕育的产物,也是明清江南小说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其三,“四大奇书”的提出,还隐约透露出“尊体”的信息,如有学者说,虽然“小道可观”这一传统小说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尚未能彻底改变,但具体到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评判,此评价体系已开始有所转化<sup>①</sup>。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晚明江南文化生态,成为酝酿和促成这一观念转换的重要土壤,“小道”视之的通俗小说,悄然间在向文体意义的“经典小说”迈进。

### 三、小说批点与小说经典初步确立

李渔《闲情偶寄·词采第二》中说:“施耐庵之《水浒传》,王实甫之《西厢记》,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噫,知言哉!”他赞同金圣叹称《水浒传》《西厢记》为“才子书”,誉其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是天下最好的文章,可谓的评。

经典之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它们自身的蕴含和价值。明清时代堪称经典的几部通俗小说作品,在它们问世后,便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阐释,批评家乐此不疲地发掘其丰富的蕴含奥妙。如庸愚子序《三国志通俗演义》云:“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云:“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天都外臣叙《水浒传》云:“载观此书,其地则秦、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狙佞舆台,粉黛缙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异同,欣戚合离,捭阖纵横,揣摩挥霍,寒暄颦笑,谑浪排调,行役献酬,歌舞谲怪,以至大乘之偈,《真诰》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纪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杂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纟。此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谢肇淛跋《金瓶梅》云:“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媒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

<sup>①</sup>谭帆:《“四大奇书”:明代小说经典的生成》,《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1页。

之期，尊壘枕席之语，狙侏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谄逢迎，奴伶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馘意快心。譬之范公抔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袁于令《西游记题词》云：“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通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哉？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惺园退士序《儒林外史》云：“《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戚蓼生序《红楼梦》云：“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揆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譔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芍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迂乎？”各自从不同层面，分别揭示了作品博大的意蕴或奥秘的艺术。这些作品卓越的开创、伟大的张力及其在小说史上的范式意义，奠定了其成为经典的基础。

明人陈明卿云：“文字，山水也；评文，游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犹山水得风而鸣，得雨而润，得云而鲜，得游人闲懒之意而活者也。”<sup>①</sup>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正如山水胜景，需要有不凡的鉴赏眼光来鉴赏激活。明清江南涌现出一批小说精评，其深度评点，毫无疑问彰显了一流小说伟大的蕴含和价值，揭示了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美学贡献，使之“经典”地位赖以得到初步确立。

据笔者初步统计，明清江南小说评点家约60余位。其中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以上三种多认为是无锡叶昼评点）、《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长洲陈仁锡明卿父校阅）、《型世言》（崢霄馆评定）、《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评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认为该书批评者为李渔）、《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笠翁评阅）、《醉耕堂刊王仕云评论五才子书水浒传》（徽州歙县王望如评点）、《无声戏》《十二楼》（以上二种有睡乡祭酒在江南批评）、《西游证道书》（西陵残梦道人汪憺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四大奇书第一种》（毛纶、毛宗岗评点）、《水浒后传》（雁荡山樵评）、《东周列国志》（秣陵蔡元放批评）、《西游真诠》（悟一子批点）、《北史演义》（云间许宝善穆堂批评）、《南史演义》（云间许宝善穆堂批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王希廉评点）、《桐花凤阁评红楼梦》（陈其泰评点）、《儒林外史》（卧闲草堂、黄小田、张文虎、徐允临评点）、《增评补图石头记》（姚燮评点）、《金瓶梅》（文龙评点）、《增评补图石头记》（诸联评点）等，均在小说评点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水浒传》金圣叹评、《金瓶梅》张竹坡评、《三国演义》毛氏父子评，更是小说评点史上的翘楚之作。其中，金圣叹批点最为好评如潮，此不赘述。

《水浒》金批、《西游记》李批、《金瓶梅》张批、《三国》毛批、《儒林外史》卧评、《红楼梦》脂批等，其对于作品内蕴的揭示，及其在小说传播史上的意义，现代人论述已夥，兹不赘述。清人余扶上《圣叹〈六才子书删评〉序》云：“先生未批以前，《水浒》贼书，《西厢》淫书。今而知《水浒》之变幻离奇，直

<sup>①</sup>陈明卿：《昭华馆序》，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287页。



进于《易》;《西厢》之缠绵浓郁,直进于《诗》。”<sup>①</sup>黄叔瑛《三国演义序》云:“院本之有《西厢》,稗官之有《水浒》,其来旧矣。一经圣叹点定,推为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遂成锦心绣口,绝世妙文;学士家无不交口称奇,较之从前俗刻,奚翅什伯过之。信乎,笔削之能,功倍作者,经传为然;一切著述,何独不然。……最后乃见声山评本(《三国演义》),观其领挈纲提,针藏线伏,波澜意度,万窍玲珑,真是通身手眼。而此书所自有之奇,与前此所未剖之秘,一旦披剥尽致,轩豁呈露,不惟作者功臣,以之追配圣叹外书,居然鼎足,不相上下。”觚庵赞毛评:“《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之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sup>②</sup>这些论说,便具体恰切地揭示了几种评点的重大意义。小说经典之作,正有赖于这些重要的评点,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经典的初步地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江南评点家对于小说文本的批改编选,在通俗小说经典化进程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如“三言”之成为经典,与冯梦龙的精选精改直接有关。其过人的审美眼光,保证了其所选作品的价值;其对于宋元旧篇或规范统一形式体制,或修饰增补删减文字,或重起炉灶进行二度创作,则使得其所选作品在内蕴上得以提升,在形式上更具有范式意义。“三言两拍”成为经典,与姑苏抱瓮老人选辑《今古奇观》的广为传播关系匪浅。《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的增删,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删定,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修订,论者已多有揭示,不赘。金评《水浒》、毛评《三国》在清代成为最流行之本,几乎造成众本皆废的局面,足见其影响之大,亦可察知它们对于小说经典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 余论

小说文体由卑而尊,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登高一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sup>③</sup>由此正式拉开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序幕。虽然这代小说家和批评家“自觉不自觉地与前人的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不愿意直接与之认同”<sup>④</sup>,甚至如梁启超还讲过中国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海盗海淫两端”<sup>⑤</sup>的话,但毋庸置疑,“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人们对于传统小说,也“逐步由‘骂’转‘捧’,力图证明中国传统小说的特殊价值”<sup>⑥</sup>。光绪二十九年(1903)迄三十年(1904),《新小说》刊发饮冰(梁启超)等人的《小说丛话》,其中如平子(狄宝贤)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社会之情状,略见一斑。……《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红楼梦》一书,系愤清人之作……《红楼梦》之佳处,在处处描摹,恰肖其人”;曼殊说:“《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同认也”,“《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侠人说:“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定一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

①余扶上:《十松文集》卷一,康熙刻本。

②俞明震:《觚庵漫笔》,见《小说林》1908年第11期。

③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45页。

④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⑤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册。

⑥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6—17页。



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馀赐,实施耐庵之功也”<sup>①</sup>,正透露出这一微妙变化的信息。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传统小说观念方始发生根本性扭转。光绪三十年(1904)黄人始撰《中国文学史》,设《明人章回小说》专节,对通俗小说予以较高评价;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僊生(王钟麒)刊发《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明确提出“中国历代小说史”概念。1920年至1926年,鲁迅更先后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其间,1920年油印《中国小说史大略》讲义,1923年北京大学新潮社铅印正式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应该说,也只有到了“小说”文体得到尊重,成为经典文体之后,明清通俗小说中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作品,才成为社会公认的完整意义的经典作品。

虽然如此,晚明以来通俗小说的江南传播,在通俗小说经典化进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着不可轻忽的历史意义。首先,明清江南出版业将这些小说首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小说作品得以及时地呈现给读者,不至于湮灭散佚;其精刊精印,使得这些作品有了相对定型的文本,成为一种客观的“经典”存在;“奇书”“才子书”的出现,标志着小说“经典”的发现,特别是“奇书”概念的提出,虽然不够理直气壮,却是暗含了小说尊体的开始;精批精评,深度阐释,则意味着“小说经典”万事俱备,经典地位初步得以确立。其次,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传播过程,其首刊精刊精评、“奇书”“才子书”的提出,均发生在江南,还透露出文学经典化与文化生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晚明以降,江南之所以成为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中心,与该区域大众娱乐文化思潮崛起、思想观念开放等,有着直接的关系。通俗小说经典与江南的这种关系,可谓是因缘合成。

(责任编辑:邓晓东)

## Dissemin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Popular Novels in Jiangnan Regio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ENG Bao-shan

**Abstract:** The canonization of popular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i.e. the texts that had been originally ignored were regarded as the classics worthy of aesthetic examination ) took place only after they were acknowledged to form a legitimate literary genre and no longer held in “low regard” as before. To the canonization of popular novels in that period, the publisher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 geographically area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for they published the first edition and the edition with exquisite printing quality of such novels. This made the novels available to their readers at the right time in a relatively unified form and consequently enabled them to become literary canons. Additionally, in the Jiangnan region, some popular novels had already been well accepted and some famous ones even acquired the title of “literary wonders” . The notion of “literary wonders”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great works of fiction were discove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fiction as a literary genre began to win public acknowledgement. Furthermore, the scholarly col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popular novel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helped reveal the profound meaning and 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embedded in such works, thus indicating the novels began to be regarded as literary canons. Therefore, the dissemination of popular novel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canonization process of such novels and a literary event with tremendou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Jiangnan Reg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opular novels; dissemination; canonization

<sup>①</sup>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第54—69页。